

華大
博雅
学术文库

社会学文丛

蔡志海 著

Nongmin Jincheng

Chuyu Chuantong Yu Xiandai

Zhijian De Zhongguo Nongmingong

农民进城

——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农民工

作为宏大历史事件的农民进城必将成为过去，而农民工的未来命运
则必将与城市化、非农化紧密相联！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由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社会学文丛

农民进城

——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农民工

Nongmin Jincheng
Chuyu Chuantong Yu Xiandai
Zhijian De Zhongguo Nongmingong

蔡志海 著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民进城——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农民工/蔡志海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

(社会学文丛)

ISBN 978-7-5622-3845-4

I. 农… II. 蔡… III. 农民—劳动就业—研究—中国 IV. 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9858 号

农民进城

——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农民工

© 蔡志海 著

责任编辑:高东军

责任校对:王 炜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文编室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707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督印:章光琼

字数:229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9

版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25.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序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当中国社会进入快速社会转型时期,出现在中国社会上最为声势浩大的社会流动现象就是农民进城——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以谋求新的职业,同时也意味着农业就业人口不断减少。这一宏大的社会历史事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社会结构性原因,进城的农民工们在城市中是如何开展新的生命历程、与城市社会进行互动的,进城后他们自身的人格结构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如何帮助他们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些问题引导学者们对农民进城这一现象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探讨。蔡志海的博士论文就是一部研究这一宏大历史事件的论著,欣闻其即将出版,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应该说点什么,权以为序。

通观全书,作者紧紧抓住了进城农民所处的时代背景,深入探讨了农民进城的现实原因,完整描绘了农民工自身的生存状态,全面分析了农民进城对其自身及社会的影响,并提出了进城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的相关方案,对实现农民工转型的可能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该书的特色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视角独特。该书虽然研究的主题仍然是农民工,但是与大多数研究的切入点不同,该书以农民进城为切入点,把农民进城看成是一个宏大历史事件,将农民进城放在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社会快速转型和多元互构的背景中进行思考。不仅深刻地探讨了转型中的农民工,而且还探讨了农民工的转型问题,体现了社会转型论的视野;不仅全面讨论了农民进城的社会性原因,还探讨了农民进城的社会性后果,体现了社会互构论的思维。

第二,方法合理。该书试图将方法论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

合起来,具体技术上则采用了文献研究、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家计调查等方法,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作者力图反映作为总体的进城农民的基本状况,同时还试图深入到进城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之中,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和喜怒哀乐,体现出研究者应有的人文关怀。

第三,观点新颖。该书研究的涉及面较广,虽没有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但是也不乏某些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如以制度变迁为背景,将我国农民进城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分析农民进城的原因时认为农民进城在宏观层面是农村推力与城市拉力合力作用的结果,而在微观机理方面则体现为理性与感性共同选择的结果;在分析农民进城的后果时,从个人与社会两个方面探讨了这种后果;在思考进城农民的社会支持时,提出了一个包括价值系统、制度系统、组织系统和网络系统的完整社会支持系统模式;文章还提出了“农民工转型”这样极富创造性的概念。

第四,行文流畅。该书结构严密,逻辑清晰,行文流畅,读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体现出作者较好的学科理论功底和文字表达能力。

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具体方法上,尽管研究数据基本反应进城农民工的情况,但问卷调查的样本量仍然偏小;二是在理论分析上,文中对某些问题的讨论不够深入,例如,关于农民进城的微观机理研究略显简单,关于农民工转型只是提出了概念和简单的预测,并没有一一分析各种可能性。

作为社会学的青年研究者,蔡志海的博士论文公开出版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希望同行专家给予关注和批评,以促进青年研究者的成长。这也是本人为此书作序的愿望之一。

郑杭生

2008年6月2日

于武昌桂子山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问题	(1)
第二节 已有的研究	(4)
第三节 研究方法	(29)
第四节 主要概念	(39)
第二章 我国农民进城的历史阶段	(42)
第一节 1949—1957 年:大量涌入期	(42)
第二节 1958—1979 年:严格限制期	(46)
第三节 1980—1991 年:逐步松动期	(50)
第四节 1992 年至今:调控服务期	(54)
第三章 当代中国农民进城的现实原因	(62)
第一节 有关农民进城原因的理论	(62)
第二节 农民进城的宏观原因:推力与拉力并存	(67)
第三节 农民进城的微观机理:理性与感性之间	(79)
第四章 进城农民的生存状况	(89)
第一节 进城农民的职业境遇	(89)
第二节 进城农民的生活状况	(102)
第三节 进城农民的社会地位	(120)
第四节 进城农民的社会网络	(137)
第五节 进城农民的城市适应	(147)
第六节 进城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冲突	(155)

第五章 农民进城的后果分析	(160)
第一节 农民进城对个人的影响	(160)
第二节 农民进城对社会的影响	(190)
第六章 进城农民的社会支持系统	(233)
第一节 进城农民社会支持系统的现实意义	(233)
第二节 进城农民社会支持系统的基本模式	(245)
结语：农民工转型与国家现代化	(260)
参考文献	(265)
后记	(282)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的问题

在提出研究的问题之前,首先来简单考察一下 20 世纪两个国家的农业与农村人口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1946 年,作为法国第一产业的农业占据其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所占比例达到了 36%,而第三产业则为 32.5%;但是到了 1975 年,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下降到了 10%,而第三产业的比例则上升到 50.8%^①。这一变化与大量农业人口向其他产业的转移是密不可分的。尽管 20 世纪 60 年代的法国仍处于战后重建的进程之中,但是农业劳动者的下降趋势似乎不可避免,这也是当时整个欧洲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一不可违逆的历史潮流的必然产物。1967 年,法国著名社会学家亨利·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出版了《农民的终结》(*La Fin des Paysans*)一书,在书中,他预言——甚至是断言——法国的小农作为一个阶级的消亡趋势;当时的法国,作为欧洲最大的农业国,面临着农民数量的急剧减少,农业从业人口大幅向第三产业转移的状况^②。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东方的中国,在对现代化的孜孜追

① [法]德尼兹·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等:《欧洲史》,蔡鸿滨、桂裕芳译,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77 页。

② [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求之中,城市开放与农村改革齐头并进。80年代以来,农业虽然仍扮演着国民经济的主要成分的角色,但是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等推力因素以及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展等拉力因素的作用,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农业就业人口不断减少。最初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地转移,即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就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后来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农民自发地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2003年,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个行政村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我国有1.139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占农村劳动力的23.2%;其中,6910万农村劳动力到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占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61%,5620万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占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49.9%^①。2004年,尽管国家的农业扶持政策使得一部分外出务工的农民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尽管多种因素的作用导致了部分沿海城市出现所谓的“民工荒”,但是,从总体上看,农民工数量仍是十分庞大的。农业部数据统计结果显示,2004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约1.03亿,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1%。2005年5月,劳动保障部的快速调查统计显示,目前在城镇的农民工总数约为8907万人。这一数字显然比实际规模要小,从过去进行的抽样调查结果看,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除了进入城镇从事非农职业外,大约有20%进入农村从事非农产业。按照这样一个比例,加上补足5%的漏报比例,可以推算农民工流动就业的数量约为1.2亿,其中进城农民工约为1亿,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约为6000万^②。2006年3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

① 中国人口网, http://www.chinapop.gov.cn/rkxx/ztbd/t20040517_13028.htm, 2005年6月20日。

②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课题组:《当前农民工流动就业数量、结构与特点》,载《中国劳动保障报》,2005年8月3日。

4779 万人,而且绝大部分是农民^①。在大规模农民进城的同时,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也不断加快,有学者惊呼中国正在经历“村落的终结”,1985 年到 2001 年,中国的村落个数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合并等原因,从 940617 个锐减到 709257 个,仅仅 2001 年一年就有 25458 个村落消失^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开始恢复重建,到 1960 年欧洲的重建基本完成,之后就逐渐步入繁荣发展时期(1960—1974),而法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正是在这一时期进行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同样也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两个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但却同样历史悠久的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轨道中,都出现了农民数量减少、农村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现象。这种基于不同背景上的共同之处绝非偶然,宏观观之,可以说是社会变迁的必然趋势。然而,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样一种笼统的说法,怎能将社会变迁带给农民的酸甜苦辣描绘清楚呢?又怎能将发生在农民身上的诸多变化阐释清楚呢?……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002 年,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用 13 个字概括出中国“三农”问题。此后,“三农”这个始发自民间研究组织用来形容农业、农村、农民的词语在几度辗转徘徊之后终于被官方所接受,并成为红头文件的专用名词。时下的中国,“三农”问题不仅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极其关注的话题,同时也是学术界的热点课题——“三农”问题被放在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的农民长期以来都是一

^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060316_402310923.htm, 2006 年 10 月 25 日。

^②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1 页。

个饱受剥削和压迫的群体,那么在当今这样一个清明盛世,农民可以独立地进行生产经营,开创自己的生活空间的社会中,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反而会出现农民问题受到如此关注的状况?或许真的如李昌平所言,“三农”问题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非解决不可了,否则就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如果进行逆向思维,应该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哪怕是在当前的清明盛世中,农民以及与农民相关的农业、农村问题的解决也绝非易事。因此,这需要我们对“三农”问题进行长期的关注和研究。

不过,“三农”问题纷繁复杂、头绪万千,研究者有必要选取一个可能的角度和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的一个最为声势浩大的现象——农民进城——已经被众多的学者所关注和研究,形成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只要农民进城的现象一日不终,对农民进城问题的研究就不应终结;只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没有完成,就不应忽视对农民进城逐步实现城市化、获得现代性这一看似平常而实则意义重大的现象的研究。

在本书中,笔者试图对农民进城这一现象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全方位考察。在回顾新中国农民进城的基本历史阶段的基础上,探究当代中国农民进城的现实原因,深入了解进城农民在城市中的生存状况,并从农民进城后的迁居状态和迁居心理上对进城后的农民做一个类型学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农民进城对个人与社会两方面的影响,然后从政策的角度探讨进城农民的社会支持系统的建构,最终展望农民工转型与国家现代化的基本前景。

第二节 已有的研究

当前,关于农民进城的研究很多,这也是我国目前的现实社会变迁和社会流动状况的一个侧面反映,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从事非农职业,形成所谓的“民工潮”,才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范式、视角

和框架出发,研究了农民进城这一宏大历史事件中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各个方面,形成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下面,笔者将这些研究分为一般理论研究和具体经验研究两个方面来进行检视。

一、一般理论研究

1. 研究范式

关于农民进城研究的基本范式,有研究者指出,国际社会学界对人口迁移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种范式:

一是古典和新古典主义下的“均衡”范式。人口流动被视为是由于资源分布不均衡而引起的(典型的如“推一拉”理论),而其结果则是使经济要素在各地域间形成新的平衡。移民在迁入社会的适应,也被假设为一个随着时间推移彼此不断同化的过程。

二是结构—历史—功能主义的范式。认为人口流动不全是物质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反应,而与一系列的传统、结构和历史因素有关。比如人们用“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来解释国际移民、用“国内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来解释国内移民。在此范式下,人口的流动被视为是对特定结构的回应,其结果是满足结构的某种需求,带有功能主义的色彩。

三是随着吉登斯、布迪厄等人的社会学理论兴起后而提出的“主体—实践”(agent-practice)范式。它强调移民也完全是一个能动的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每时每刻地都在以自己的“实践”来创造新的东西,而不是完全为“结构”所规定的行动者^①。如黄平等人的研究提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综合了社会学一向对立的整体论和个体论的视角,并以此尝试对农民的非农转移做出新的理论说明。他们认为,就结构和主体的关系而言,如果没有结构性因素和条件提供的可能和制约,农民不可能外出,反之,如果没有农民外出的需求,无论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也是没有意义的;就农民的行为而言,农民在外出和转移过程中总是

^① 项飏:《传统与新社会空间的生成——一个中国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历史》,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不断反思自己的行动,改变自己的目标。因此,这些行动的后果,常常是未曾预料的,更不一定是“合乎理性的”。^①

2. 理论视角

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有关农民进城这一现象的研究,以两种分析框架为主。一是将社会流动放在社会结构中来探讨,首先设定社会是以分层或地位的方式构成的,然后再将流动的概念放入其间来考察各种社会成员因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在其中形成的流动驱力、规模、方式、功能或由此而生的社会问题等。二是运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将个体的流动过程看成是其通过建立关系网络来实现的。后者与前者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后者不强调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属性,比如性别、年龄、身份、阶层等,而是强调个体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的相对优越位置,以及他所能获得的促使其流动的资源在哪里。^②

还有学者综合了国内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明确指出这些研究所采用的五种主要的理论视角:(1)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视角,认为农民工群体的产生是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分化的结果,他们的地位虽高于仍在农村务农的农民,但在城镇等级分层体系中仍处于最下层,他们的流动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劳动力流动,更是一种社会流动,它包含着社会地位的变化;(2)冲突与失范的视角,在城市居民的眼中,流动农民是外来者、无根的非市民、流浪者,像漫无目的、漂泊不定、不祥的洪水一样,持续地、不合适地、无控制地涌进城市,成为中国城市中的“另类”,他们极可能在城市中造成冲突与失范;(3)人的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视角,这一视角的研究者注意到了农民进城这一历史事件对农民个人和流出地农村社会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农民进城是一个获得现代性的过程或二次社会化的过程,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农民进城对于提高农

① 黄平:《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② 翟学伟:《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载《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

民经济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农村社会现代化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4) 社会网络的视角，前述三种研究视角可以说都是地位结构观，社会网络视角则是一种网络地位观，此种视角将流动农民看做是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结点，他们通过网络来求职和生活；(5)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视角，这种视角的研究者认为改革前重国家、轻社会的模式已经改变，大规模农民流动出现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家从乡村社会生活中的部分退缩，研究者主要考察的是利益集团或精英人物的作用，而这些精英分子以经济精英为主，在目前情形下，他们还不会形成与国家的直接对抗^①。

二、具体经验研究

社会学认为，农民流动进城不仅仅是劳动力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流动，包含地域流动、职业流动和阶层流动三个方面^②。就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来看，大多数国内学者更多倾向于实证的、经验的研究，这显然与农民进城这一社会事实的基本属性有关。综合看来，学者们关注的是以下几方面的内容：进城农民群体的流动行为；进城农民群体的生存状态；进城农民群体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分层；进城农民群体流动问题，包括流动本身以及由流动引起的问题；流动人口管理；进城农民的权益保障；等等。

1. 进城农民群体的流动行为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的农民进城运动，是中国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自发性社会流动，其背后的动因是什么？他们是以何种方式进入城市的，又怎样通过网络在城市中谋职和生活的？这些是有关进城农民群体流动行为中最受关注的几个方面。

流动动因是进城农民群体流动行为研究的首要问题，它能揭示出

^① 王毅杰、王微：《国内流动农民研究的理论视角》，载《当代中国研究》，2004 年第 1 期。

^②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载《社会学研究》，1996 年第 4 期。

为什么在制度壁垒依然很强大的环境下农民仍要进城的原因,这也是早期在中国农民进城研究方面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大多数学者借助西方学者在研究人口迁移和流动时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农民进城现象,其中特别是以借鉴“推一拉”理论为主,以此来说明农民进城的宏观原因。根据“推一拉”理论,中国当前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特别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导致了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流向发达地区和城市,学者们对农民进城过程中的推力、拉力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一些学者还对推力、拉力因素在实际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检验^①。除了从宏观层面解释农民进城外,一些学者还从微观层面研究了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原因,认为中国农民是否外出,是家庭整体决策而非个人行为的结果,其首要目的是增加收入,并且将外出看做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这种投资的预期与人力资本的状况如年龄、性别、教育状况等是相关的,学者们还针对“盲目外出”的说法,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理性”的概念,如经济理性、迁移理性等,其共同点是认为外出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②。还有学者提出“生存理性”概念,认为农民进城是为了寻求生存甚至是为了糊口,而非在市场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寻求生存是中国农民在现实面前作出种种选择的首要策略和动力^③。有学

① 相关研究很多,参见张仁寿:《农民进城动力探析》,载《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第3期;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Huang Ping, China's Rural Labor Migrants under Uneven Development,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3(4);应凤其、张忠根:《农民进城:动力、阻力及制度创新》,载《农业经济》,2002年第10期;邹新树:《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动因:“推一拉”理论的现实解读》,载《农村经济》,2005年第10期。

② 黄平:《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杜鹰、白南生:《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蔡昉:《中国流动人口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 黄平:《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者则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出发,提出了“社会理性”的概念,把人的理性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认为在农民外出就业发生初期,其往往更多地表现为生存理性选择,但随着外出寻求就业次数的增多和时间的拉长,社会理性选择和经济理性选择将表现得越来越突出^①。

流动方式是国内学者在研究农民进城行为时的又一重要关注点。经典的人口迁移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由独立的个人为达到预期收入最大化而进行的,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迁移经济学认为,人口迁移的决定并不是由独立的个人作出的,而是由相关的更大单位特别是家族或家庭来共同作出的。这里,人们的行动可以被称之为“集体化”的行为,它不仅可以使个人的预期收入最大化,而且还可以使家庭风险最小化,并尽量脱离与本地各种市场相关联的条件的约束^②。中国农民进城的方式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农民进城主要是为了获取较高的经济收入,这一点似乎是无可置疑的,其决策受到家庭的影响,并且表现出家庭化的流动趋势^③。但是有研究者指出,家庭是否能够简单化为一个“整体”,从而所有的决策都是“天然”地从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出发?谭深的调查表明,如果将外出动机的指向分作“为家庭”和“为自己”两项,相当大

① 文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6期。

② Dounlas S. Massey, etc., 1993.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 (3): 431-466.

③ 可参见陈寿贤、孙丽华:《武汉市流动人口家庭化分析及对策思考》,载《中国人口科学》,1996年第5期;周林刚:《社会学视野中农业劳动力流动决策的理论模型——对甘肃省东乡族苜叶里社区的调查》,载《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周皓:《中国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载《人口研究》,2004年第6期;吴兴陆:《农民工定居性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载《人口与经济》,2005年第1期;郭江平:《农村流动人口流动家庭化现象探析》,载《理论探索》,2005年第3期;等等。

比例的外出者主要从自身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主要从家庭的需要出发外出打工的^①。

随着社会网络研究的兴起,国内学者也开始将网络理论应用于农民进城的研究,因而流动网络也是近年来学者们研究农民进城行为的一个侧重面。调查显示,农民进城所依靠的社会资源最主要的不是来自政府和市场,而是来自社会网络,在农民工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这种社会网络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些学者研究指出,农民进城后,尽管所面临的环境不同,职业及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但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以血缘、地缘等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的依赖^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在于在缺乏社会公开信息供给和组织服务的情况下,或者说在市场与组织的低效或无效的情况下,社会网络的存在无疑降低了他们的流动风险和成本。或者说,社会网络作为一种与“现代性”原则格格不入的传统社会关系,成为权力、市场之外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但在随后的再次职业社会流动过程中,原有社会网络成员所发挥的作用就发生了变化,流动农民不得不寻求新的业缘关系网络、就业市场信息等途径^③。进城农民的社会网络中主要是由强关系构成,其社会支持也基本上是来自强关系,但与此同时,农民工流动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重新构建新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网的过程,农民工在城市也经历了学习和再社会化过程,其中一部分扩展了弱关

① 谭深:《打工妹的内部话题——对深圳原致丽玩具厂百余封书信的分析》,载《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6期。

②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载《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赵树凯:《纵横城乡——农民流动的观察与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61~69页。

③ 袁亚愚:《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课题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载《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李强:《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